

米歇尔·福柯，1926 - 1984^①

爱德华·赛义德 著

吴 琼 译

据《世界报》（1984年6月27日）发表的医学报告称：米歇尔·福柯于6月25日13时15分在巴黎的萨勒贝蒂尔医院去世，死因是恶性败血症导致的神经病综合症。与公告同时发表的还有一系列特别的悼念文章，并在同一页冠以两栏的标题：“哲学家米歇尔·福柯逝世”。其中头版的文章是福柯生前在法兰西学院的著名同事皮埃尔·布尔迪厄撰写的。简直难以想像，在法国还有哪一位当代哲学家的死引起过像福柯这样集中和令人倾慕的注意，他的哲学和历史著作尽管晦涩并充满不妥协态度，却还是获得了总理颁发的纪念奖。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福柯的死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正如人们所说，他的思想的力量和影响是令人惊讶的，同时也将是永恒的。

我认为，福柯堪称是当代最伟大的尼采信徒，同时也可能是20世纪西方知识界最引人注目的反对派的核心人物。福柯与让-保尔·萨特、莫里斯·梅洛-庞蒂、乔治·冈奎汉姆、让-皮尔·韦曼特、吕西安·戈德曼、路易·阿尔都塞、雅克·德里达、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吉尔·德勒兹等人一起，揭开了巴黎美学和政治思潮中一连串奇妙的革命性篇章，在近30年

的时间里，出现了一系列辉煌的巨著，这种成绩是后代的我们再也不可能看到的。他们的存在可谓是现代思想的一次真正剧变，学科与实际语言之间的障碍被打破了，这样，由这些障碍分离的各领域从表面到它们最复杂的上层结构全都重新被改造了。具有令人惊讶的丰富性的理论和意象以及巨大的形式体系——且不说那些初看起来粗野但立即就变得时髦的术语——从这些明星的著作中流淌而出，他们的血统是学者与暴动者的矛盾混合。所有的人似乎都深深地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个别的还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弗洛伊德的影响；绝大多数人都是修辞学辩士，沉迷于把语言看作是一种观看现实的方式，尽管实际上并不是建构现实的方式；多数人都受到大学课程和几乎传奇的教师们的影响——其中加斯通·巴什拉、乔治·杜梅泽尔、爱弥尔·本维尼斯特、让·伊波利特、亚历山大·科热夫这些名字（后两位有关黑格尔的著名讲座和研究班似乎造就了整整一代人）出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同时他们还受到了超现实主义诗人和小说家如安德列·布勒东和雷蒙·罗塞尔，以及特立独行的作家兼哲学家乔治·巴塔耶和莫里斯·布朗肖的影响。不过，所有这些巴黎知识分子都深深地扎根于法国生活的政治现状，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洲共产主义的反应、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1968年5月风暴。在法国之外，最有影响的是德国和德国思想，英国和美国作家的著作则影响极小。

甚至在这一空前的独特集团中，福柯也是最突出的。在有些人看来，他的学问是最为渊博的：其研究对象最为具体也最有历史意味，同时在理论研究方面他也是最为激进的。在另一些人看来，他似乎最有可能是为了自己而从事研究，（用布尔迪厄描述他的话说：“以知识为乐。”）因而他是最少巴黎味的，也是最不流行、最不时髦或最少受到中伤的。更为有趣的是，他的研究覆盖了社会和知识史的巨大领域，传统的和非传统的著作他都阅

读，并且都同等的认真，他似乎对日常事务或没有创新的东西很少说长论短，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在冒险诙谐地从事一般的研究。他既不单一地只是一个历史学家，也不只是一个哲学家或文学批评家，他是所有这些东西的结合体，并且永远都是。和特奥多·阿多诺一样，福柯的态度是严谨的、毫不妥协的和苦行的，尽管与阿多诺不同的是，他的晦涩与他那绚丽的文体没有太大关系，而是与他的整个研究所涉及的关于文化、社会和权力的那些吸引人并常常晦涩的大量理论和想像性的论点有关。

总之，福柯是一个多产作家，他所借助的文类——但在他的作品中又超越了一切——有虚构文学、历史、社会学、政治科学以及哲学。因此，他有意地赋予了他的著作一种不受约束的特征，这也是尼采和后现代著作的特征：从激进主义的方面说，它是反讽的、怀疑论的、放肆的；从颠覆正统、偶像和神话的方面说，它又是滑稽的和超道德的。不过，在福柯最不具个人特色的散文中，人们仍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他作为一种文化形式而成为采访的主角并不是偶然的。因而，批评与创造之间古老的可接受的划分不适用于福柯的作品和言论，正如它也不适用于尼采的作品、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巴特的一般著作、吉伦·古尔德的钢琴和即兴表演、阿多诺的理论或传记断片，以及约翰·比尔格、皮尔·博利兹、卢齐诺·威斯康狄或让·路克·戈达尔的作品一样。这并不是说——例如——福柯的历史就缺乏历史的有效性或准确性，而是说——和刚刚提到的那些人的作品一样——这些历史作品作为人工产品的形式和内容需要首先引起注意，要把它们看作是当代具有自我意识并混合着各种文类的表演，其中充满了学识、引文和创新。

尽管福柯的学术生涯至少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但有许多主题在他的作品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我们最好把这些主题看作是观念群的麋集，而不是静止的对象。在福柯研究和写作的东

西中，存在着一连串贯穿始终的矛盾，而这正是他的著名的考古学和尼采式的谱系学的核心所在。自一开始，福柯似乎就把欧洲的社会生活理解为是边缘人、罪犯、另类与可接受者、正常人、一般的社会人或同类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发源于各种各样的态度（并且分娩和生物物种的隐喻对于福柯的事物概念也是重要的），这些态度后来进一步发展为构成知识的学科建制和监禁体系。由此，我们产生出了临床医学、监狱、收容院、医学实践机构、刑事科学和规范法学。这些东西转而又生产出对自身的抵抗，并进而导致了在同一建制内的各种变化，直到——并且，这是福柯晚年阐述的一个惊人的见解——监狱和医院后来分别又成为行为不端者和病人的工厂。其后，福柯又证明说，权力就寄生在那一系列的两个方面，即建制和科学的内部，并注定会迅猛地在集体和个人中作为一种有吸引力但常常根源于暴乱者的压力的形式，走向监禁和知识的生产——对疯癫者、空想者、违法者、预言家、诗人、流浪汉和傻瓜的监禁和生产。

福柯著作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的另一个主要的观念群就是知识本身。他研究了知识的起源、它的形成、它的组织、它的变化方式和稳定性，以及对它的庞大的物质存在、它的网状的复杂性、它的认识论地位以及它的最细小的细节的常规认识。他有意识地把他的考古学同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区分开来。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想利用历史来反对历史，以“切断它同记忆、同它的形而上的和人类学的模式的联系，建立一种反记忆——一种使历史成为总体上不同的时间形式的变形”（《尼采、谱系学与历史》）。

因此，福柯在他自己与知识之间确立了一种逐渐展开的、复杂的和矛盾的态度，在此我只想对他生平的三个阶段的著作作一扫描式的审视。他在第一阶段的主要著作中——《疯癫与文明》（法文版为《疯癫史》，1961年出版；英译本1965年出版）和《事物的秩序》（法文版为《词与物》，1966年出版；英译本1970

年出版) (这些译本与法文原著之间有着十分近似的关系, 不论是标题还是文本, 这一点可以说是福柯著作的英译本显得希奇古怪的一个说明)——是热情的、冷漠的和博学的研究者, 他发掘文件, 搜寻档案, 对经典文本进行重读和解神秘化。后来, 在第二阶段的《知识考古学》(法文本 1969 年版, 英译本 1972 年版) 和《论语言》(法文本《话语的秩序》1970 年版, 英译本 1972 年版) 中, 他不是直接切入知识的问题, 而是编织出一个完整的系统机制, 以便能够说明知识处理其素材的方式。也就是说, 在这一期间, 知识被拆开并被重新组合进入了福柯的术语: 这一时期, 档案、话语、陈述、陈述的功能这些术语充斥在他的字里行间, 这一方式并不完全能作为这个沉迷于准确分类的法国人的标志, 也不是他控制、生产其对知识作为一种显见的心灵牢笼的明显敌意的标志。不过, 矛盾的是, 福柯著作中的偏爱整个地说还是理性的、冷静的和平和的。但随着《规训与惩罚》(法文本 1975 年, 英译本 1977 年)——它直接产生于福柯为了囚犯而从事的工作——和《性史》(法文本 1976 年 英译本 1978 年)——它的基础在福柯自己的性别认同历程中是显而易见的——的出版, 知识显然已经被转换成了一个对手。对于权力, 他持有一种悲观主义的态度却又依附于它, 并且始终如此, 但又时常被击败, 由此产生了对权力的抵抗。最后, 在福柯著作的核心, 存在着各种各样具体的观念, 它们常常传达着他者的情感。在福柯看来, 他者本身既是一种力量, 又是一种情感, 他的著作反映和结构的正是他者表面上看起来无休无止的变形。正如我已经说过的, 福柯显然是要讨论与社会相冲突的叛逆行为和叛逆者。然而, 更为有趣的是, 他对一切越轨的行为都感兴趣, 所有这些东西是观念、描述、模仿或先例所难以企及的。这种兴趣反映出了他的反柏拉图主义和他不愿意同批评家们争论(乔治·斯泰因记得, 他只是偶然才对坚持称他是结构主义者的批评家进行过讽刺性的攻击)

的一面。在《知识考古学》中，他说他所感兴趣的是潜藏在符号和话语中能够被发现，但不可简约为语言和言语的“更多东西”；他说，“我们必须揭示和描述的就是这一‘更多’。”这一兴趣似乎有点隐晦曲折，不过它能够说明福柯的著作中存在的许多尤其不确定的东西。在他的著作中，这些东西可能是他最为拿手的，不论是对读者还是对作者而言。断裂、绚丽且具有一种生理力量的散文（例如在《规训与惩罚》的开篇对拷刑的描述，还有《事物的秩序》有关人之死的章节中更为冷静但也更为阴险有力的描述）、开创整个研究领域的怪异能力：所有这一切都来自福柯为说明他者和异端而做的持久努力，这一努力的目的并不是要对后者施以教化或使它们变成教义。

此乃是尼采的遗产在 20 世纪的一位重要的思想家的著作深处的作用。但凡特别的和特殊的东西，必定优越于一般的和普遍的东西。因而，在一次难忘的采访中，福柯说明了他对作为全体知识分子的对立面的特殊者的偏爱，对像他一样致力于学科的具体交叉的思想家而不是那些自认为掌握了全部文化的大主教（也许他说的是萨特和阿隆）的偏爱。因而，不论有多么的异化、疏离或“商品化”，现时代及其问题已经向福柯提出了研究的必要性和这一研究所要遵循的道德规范。不论是对象上的认同还是作者的认同，也不论是对象还是主体，对于他而言都没有构成人的易变的能量，或者建制以及建制发生过程中的性能重要。因此，人们感到，在福柯的著作中，话语的匿名性和规则的散漫性与声名狼藉的自我包括福柯自己的自我——它的强力的知识意志乃是对非人化的规则、无名的陈述、专业化的阐述的可怕建制的挑战——的压力之间存在着近乎恐怖的僵局。在福柯陷入——也许甚至可以说是把自己封闭于档案、卷宗和手稿的同时，他似乎在自相矛盾地激励着自己和他的听众更为强大的自主性，仿佛是要以此来证明他自己的这一论题，即权力产生抵抗，而抵抗又产生新

的权力形式。

我认为，福柯在第二阶段较多地受到了 1968 年 5 月风暴的影响；一开始，福柯是被迫作出严肃的方法论反应。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第一次接受了采访，并利用它们来发挥自己后来在《知识考古学》中阐述的观点。他的权力哲学源于 60 年代后期，他似乎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认识到暴乱者的反抗的局限性和话语规则不知不觉地控制的领域的范围的。奇怪的是，尽管福柯已经差不多倾向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和他晚年著作中的决定论，但他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可以看作是对强度和能量各有不同的快感的表达，也是对美学和知识目标的表达。有些读者认为，写于这一时期的这些有关巴塔耶、福楼拜、德勒兹、荷尔德林、马格利特和尼采的作品（其中有些已被收入唐纳德·布查编辑并详加注释的《语言、反记忆、实践》中）是福柯写得最为精彩的作品，其中有着最为真切感人的语感，绚丽但又不失平易。

然而，福柯最关键的著作还是 1970 年春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话语的秩序》（英译本译作《论语言》）。在此，他提出了自己将来在法兰西的第一学术机构的研究和教学计划。他以一种典型的方式对着他的听众发出了响彻世纪的声音，以一种混合着贝克特式的格言警句和勒南式响亮预言的语气勾勒了仅仅有关真理、理性和常态的研究目标。大约与此同时，他开始攻击德里达，他把后者看作是在国内学术讲坛主要的竞争对手。鉴于福柯明显地真正忧虑的是解构学派允许一种非历史的放任态度，有人对他有关德里达的言论——这并非他的典型语言——报以一种刻薄的和可笑的嘲笑，仿佛他在攻击的时候不得不借助于一般的反神话学和反保守主义的目标来明确地攻击以其他方式和他交往的人。就我所知，德里达没有对福柯的攻击作出回应，我认为，这是一种良知和克制的表现，正是它使得他们两人之间的芥

蒂后来逐渐烟消云散了。

要解开福柯于 70 年代增生扩散的兴趣——反常规的、常常是放肆的，且总是煽动性的和政治的——中的千头万绪，目前还为时尚早。他已经成为在全世界人气极旺的著名作家和演说家。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吸引了众多的听众，他则始终以认真的备课、对课程的详实研究、恰到好处演讲仪态和对“名课”的优良传统的尊重来回报他们的热情。他的为囚犯和刑事犯仗义执言的著作已经成熟了，且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而他对待精神病和革命的相关——十分怪异——态度也是这一时期形成的。这些——对于一个有着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经历的知识分子来说，这自然是足够了——就具体体现在他常常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著作所表现出来的敌意之中，可若是没有这两位思想家，福柯本人的思想可能也是不可想像的。但事实上，他在社会中的反常人格和他的超常的天赋使得他对自己的谱系学持有一种怀疑态度。因此他是一个自生自长的人，他认真地挑选自己的前驱，和布拉格的卡夫卡一样，他费尽心机想抹掉他生平中的某些生物学的、知识的和社会的踪迹。尤其是，他对他的同代人充满戒备，在这段时间，他对 60 年代的毛主义思潮和大肆流行的新生代哲学家——一般来说，他们是很敬重他的，因为他们再也没有其他伟大的巴黎偶像了——一直保持着距离。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福柯的兴趣从研究监禁的社会方面——他把它看作是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的反映——缩小到思考性认同的历史。换句话说，他把注意力从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建构——可通过具体的学科和话语而被认知——转向了人类的性欲——可通过欲望、快感和焦虑而被认知。即便如此，他的最后目标与他在《性史》第一卷中说过的计划还是有相当大的改变。时隔八年亦即他去世那一年出版的后两卷（《快感的享用》和《自我的呵护》）的时候，他对他的计划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他回到了古

代希腊罗马，想再次去发现个体是如何“将注意力集中于自身，把他们自己作为欲望主体来解释、承认与认知，使某种关系能在他们之间起作用。这种关系，使他们能够在欲望之中发现他们自身存在的真相，不管这种存在是自然的还是堕落的”（《快感的享用》第5页）。

导致福柯发生从政治到个人这一特殊的和多元决定的转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他对公共空间的某种清醒认识，尤其有可能是因为他感到他没法为影响它而做点什么。也许，他的声望也使得他在可怕的和强大的公共空间中，在他施于自己的博学、生产和表演的建制中感到十分放松。他引人注目地致力于研究——尽管说不上是沉迷——他对旅行和不同种类的快感（他常在加利福尼亚逗留可以证明这一点）以及日渐失势的政治立场的偏爱。然而，若就此认为他不过是另一类型的改革论者——他们已经屈从于反对古拉格、赞同苏联和古巴的持不同政见者的陈词滥调的哄骗——那就太不幸了，因为他过去完全远离这类说说而已的政治主张。

不过，我们也可以推测，福柯的转变是由于一次不平常的过火事件即伊朗革命而发生的——但有自己的特点。他是第一批考察他称为与伊朗王作对的什叶派的“精神政治”的西方人之一。他恰恰是在那里发现了那种完全集体的、无意识的过火行为，这种行为，在日常的诸如阶级矛盾或经济压迫的旗帜下是不可能形成气候的。在他发现伊朗革命的胜利加强了倒退到一种更为残暴的政治制度的力量之前，他在伊朗革命中目睹到的无休止的民怨和延搁的能量曾一度令他着迷。福柯有关非人的、无名的活动的理论似乎第一次明显地得到了实现，他似乎也是第一次因为可以理解的醒悟而退缩了。

福柯是一个真正有着远见卓识的人，他在死前已经享有世界声誉。他所有的读者肯定都会记得，在第一次阅读他的著作的

候，他们对遭遇到这样一个深刻而又异常有趣的心灵都有过一种特殊的震动，这个心灵以其文体的才能——再也没有一个作家拥有福柯这样的深度和难度——和一个接一个的思想火花向人们展示着他的思想。在这样一个多产的和彻底的研究者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著作——甚至那些宏篇巨著——总是妙语连珠，他从三四个方面对某个东西作出全新的、否定性的区分（例如“考古学”这个词在他那里既不是指思想史，也不是指知识史或心灵史）的娴熟技能似乎用之不竭，相反，这些区分只会激发读者无穷的乐趣。不过，在英语世界，他在文学理论家中间的影响最大，天哪，他们只对分析他的方法乐此不疲，而很少注意他的历史学。

另一方面，他的不足也十分明显，尽管我认为它们并不会对他的基本观点的品质和力量造成严重的危害。例如，他的最引人注目的盲点，就是他对他基本上局限于法国的材料与他得出的表面上普遍的结论之间存在的差异毫不在意。而且，他对他的著作与同样面对着排斥、限制和控制问题的女性主义或后殖民主义作家的作品之间的关系似乎也缺乏真正的兴趣。实际上，他的欧洲中心论几乎是总体性的，仿佛历史本身只在一群法国和德国思想家中间发生。还有，由于他晚期作品的目标更为私人化更为深邃，使得他的概括甚至更加没有限制，其意图似乎是为了嘲笑他已经脱离其掌控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在那一领域的冗长之作。

但是，不论我们是把福柯当作一个哲学家还是当作一个冒险地配置语言并向各种——常常是矛盾的——目标学习的超常智者来阅读和受教，他的著作都将对以后各代产生不确定的、反乌托邦的影响。他主要的积极贡献，就是他研究和揭示了知识与自我的工艺学，这些工艺学困扰着社会，使社会变得易于统治、可以控制和趋于正常，尽管它们也有自己的不可控制的本能，也有缺乏限制或理性的时候。他在批评上的伟大贡献，就是打破了作为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基础的人类学的认同模式和主体身份。福柯不是把文化和社会中的一切都看作根本上发源于某种不变的笛卡尔式的自我或某个英雄主义的孤独艺术家，而是提出了一个更为恰当的观点，即所有的作品都和社会生活本身一样是集体性的。因此首要的任务就是规避或打破意识形态的偏见，这些偏见禁止我们说那使一个医生能够从事医学实践或使一个历史学家能够写作历史的东西主要地不是个人的天赋，而是遵循规则的能力，而这些规则又被所有的专业人士看作是一种先天的无意识。福柯比他之前的任何人都更详细地论述了这些规则的规则，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还说明了长期以来规则是如何成为人们所思维、所经历、所说的东西（以及如何思维、经历和说）的认识论动力。如果他对规则是如何变化的没有兴趣，那可能是因为作为这些规则运作详情的第一个发现者，他想要每个人都意识到学科、话语、知识型和陈述真正地是有关什么的，从而避免陷入幻觉。

然而，富有绝妙讽刺意义的是，福柯恰恰就是在一个最初是精神病机构，而现在是在治疗神经病的医院逝世的，他曾为写作《疯癫与文明》考察过这家医院。这实在有点怪诞和令人沮丧，仿佛他的死乃是对他的有关正常的东西与病态的东西、理性与非理性、良性与恶性之间共生的相似性的主题的证明。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之死的哲学家”——正如福柯时常说的——在他自己死的时候似乎正是人类社会生活实际上成为真正非凡的、明显中心化和个人性的事务的一个例证。福柯比任何一个法国公众人物都更像是一个有着超自然的才能的知识分子。他从不轻率地谴责别人，只是以一种持之以恒的怀疑论和坚韧不拔的哲学严密投身于揭示权力与知识之间秘密的复杂关系的工作。而且他也是因此才成为了流行的时尚，才散发出耀眼的光辉。

注释：

选自 Raritan, 1984, vol.4, pp.1 - 11。

我想象中的米歇尔·福柯

莫里斯·布朗肖 著

肖 莎 译

首先做一点个人说明：我与米歇尔·福柯没有私交，且与他素未谋面，只有一次，在 1968 年 5 月风波期间，大概是 6、7 月，我在巴黎大学校园里（后来我被告知他当时并不在场）针对他发表了一些言论，而他却并不清楚说话的是谁……（不管诋毁 5 月事件的人怎么说，那是一个精彩时刻。当其时，任何人可以对任何人匿名而客观地发表意见。面对意见，人们不予辩解，只是偶然有人声明，那人说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的确，在那些非同寻常的日子里，我时常自问：福柯为什么不在场？这个疑问，不仅给福柯的形象赋予了魅力，而且加重了那个空位的意义。对此，我曾获得一些答复，比方说“他生性有些矜持”，或者说“他当时在国外”，但这些答复并不能使我满意。因为事实上，在那时，许多外国人都来了，甚至包括地处偏远的日本人。

福柯的第一本著作是他的成名作，交到我手上时实际上还是一部没有书名的手稿。罗杰·凯洛伊斯拿到了，推荐给我们几个人。我之所以要回忆凯洛伊斯所起的作用，是因为他如今似乎已经湮没无闻了。凯洛伊斯并非一贯都能得到行家们的欣赏。他兴趣太广泛，既是一位教育基金的评议员，又是一位革新家，他总

在主流之外，总与那些知识官僚气十足的人格格不入。而且，由于他自己养成了一种十分优雅——有时甚至过分优雅——的文风，他觉得自己肩负着维护法语语言规范的使命（他是一位严厉的守护者）。福柯的文体华丽而准确，兼具两种显然相互矛盾的品质，这使他大惑不解。文章见识非凡，蕴含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多方面的知识，这既令他着恼又令他兴奋不已。难道作者所采用的庄重的巴洛克文体并没有最终葬送他的卓越见识？凯洛伊斯吃不准。也许，他从福柯那里看到了另一个欲窃取其才华的自我。没有人希望镜子里映出陌生人来——从镜子中他看到的不是自己的影像，而是一个自己渴望成为那样的人。

福柯的处女作（我们且认定那是他的处女作）强调了与文学的某些关联，这使他后来不得不做出修正。“疯癫”一词是部分混乱之源。在仅仅还是间接探讨疯癫问题的时候，福柯就首先考察了排斥的力量。此排斥在任意一天，由某一简单的行政命令或决议实行。它不再把社会区分为善与恶，而是分成理性和非理性两部分。这一命令揭示了理性具有不纯性，揭露了权力（此处指的是统治权）与万物存在着含混不清的关系；它表明，权力不可能轻松享有绝对统治。可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排斥行为本身，被排斥的是什么并不重要；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分类本身，被区分的是什么并不重要。如果一个简单的命令就可以将历史推向某个方向，无需大规模的战斗或朝代纷争，那么，历史该是多么奇特的一种事物啊。因此，以上分类并不单纯是一种恶意行径，旨在惩罚危险的反社会的个人（游手好闲之辈、穷人、酒色之徒、亵渎神灵的人、疯癫者）；相反，其意图在于借助于某种更加难以克服的含糊性，向上述各色人等提供关照、养料和祝福，从而将他们全部纳入考虑的范围。不让病人倒毙街头，避免穷人变成罪犯，防止酒色之徒诱使虔诚者堕落，这些都不应受到指摘。相反，它们是进步的标志，是改变的开始，而这些改变是“责任担当

局”所乐于赞同的。

就这样，在其首部著作中，福柯探讨了一向属于哲学（理性，非理性）范畴的问题。只不过他是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入手，而且对历史中的某种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给予了特别重视（小事改变大局），同时避免把这种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理解为断裂（break）。（因为在疯癫者之前有麻风病患者。麻风病人消失后，空出了肉体和精神场地。正是在这些场地上，用于收容新的受排斥者的住所建起来了——尽管排斥的强制命令留存在各种动人的面目之后，而且这些面目会交替揭露和隐藏其本质。）

陷入险境的人

为什么“疯癫”一词在福柯的文本中具有如此强烈的质疑气势？这个问题值得深思。至少有两次，福柯自我反省，说自己曾受到一种观念的诱导，认为疯癫意义深刻，认为它构成了历史之外的一种基本经验，而且，对此，诗人（艺术家）可以充当目击者、受害人或英雄。假如说这一观念是错误的，那么，这一错误对福柯有益无害，因为通过这一错误（也通过尼采），他意识到深度概念有多么令人反感。尽管由此，他将在话语中搜索潜藏的含义、引人入胜的奥秘；或者，换言之，他准备追寻意义的双重或三重层面，而这些意义层，恰恰是要在取消意义自身——就词语而言即是所指，甚至包括能指——以后才能了解穷尽的。

在此，我想说，福柯尽管一度目空一切地自称是一位“快乐的乐观主义者”，而实际上，他陷入了险境。他无需夸示自己的能力，他对我们面临的危难有敏锐的感知。他力求弄清楚，哪些危险最为危急，哪些又可能与我们和解。因此，策略对于他的重要意义就此确立了下来。而这也决定了他会不时转一些念头——

他本来或许可以成为一名政治家（政治顾问）、作家（这是他一贯激烈而认真反对的术语），或者一名单纯的哲学家。

不管怎么说，福柯总在发展变化中，独自一人，暗中行动。正因为如此，他不相信有内在性，也不受主体性所设陷阱的诱惑。他质问，在何处，又通过何种方法，才会产生一种完全去除了幻象，纯然浮于表面、闪闪发光的话语——也即人们所相信的，一种与追求真理同质的话语。只是，这种话语最终必将显露追求真理的危险，揭示真理追求与形形色色的权力构形之间暧昧的关系。

告别结构主义

至少有两本福柯著作看似将某种新的知识形态展开在了未来面前。其中一本似乎比较晦涩难懂，而另一本则显得才华横溢、简单而扣人心弦。但两者外观上都具有规划性、纲领性。事实上，这两本书就像是遗嘱，其承诺不会有人遵守。不遵守的原因不在于疏忽或是无力遵守，而在于除了许诺本身之外，也许根本不存在别的实现诺言的途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福柯在著述的过程中已经将他的兴趣消耗殆尽了。就这样，福柯了结了旧账，转向了其他领域。他没有背叛自己的责任，他只是将其隐匿在某种昭然若揭的不屑态度下。福柯著述甚丰，但他却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善意或恶意的提问者要求他自我解释的时候，他总是固执地保持沉默（不过，也有例外）。

和《话语的秩序》一样，《知识考古学》是一个阶段（阶段的终结）的标志。在这个阶段中，福柯身为作家，却宣称话语实践实际上是纯粹的，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仅仅指示其本身，指示其构成法则，指示其嵌入的那一刻（假定没有本原），指示话语的产生（假定作者不存在），指明根本揭示不出任何潜藏之物的解

码活动。话语实践是不会供认实情的见证人，因为除了已经说的之外它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话语实践是漠视一切评论的写作（福柯讨厌评论），是自治的领域，但它既非真正独立，又非不可改变，因为它们永远都处于转换变形之中。假如有人想说多元性的存在意味着整体不存在，那么，话语实践就好比同时既是单数又是复数的原子。

但是，有人会说，在这场由语言学肩负职责的冒险活动中，福柯并没有做什么。他无非怀着自己个人的目的，在结构主义的临终痛苦中追求着某种结构主义的抱负。福柯从不感情用事，可是，当有人不遗余力地将他招募上一艘船，而该船已有不少杰出船长在掌舵的时候，他大发雷霆。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值得探索（但是，面对这个问题我有些窘迫，因为我意识到，到目前为止，我还从未提过——无论是赞同与否——这一生命短促的学科的名字，尽管本人与该学科的一些拥护者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就这个问题而言，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简单的（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理由是，福柯能感觉到结构主义中存在着一股先验主义的残余。因为，据结构主义称，每一门学科都受形式法则（*formal laws*）的规范；这些形式法则一方面与历史变迁不相容，另一方面，其兴衰又与历史变迁息息相关，那么，这些法则究竟是怎样的呢？它是历史先验知识（*historical a priori*）和形式先验知识（*formal a priori*）构成的一块不纯合金。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知识考古学》里一句颇具报复心的话，这句话值得推敲：

所以，把这种历史先验知识设想为一种被赋予了历史的形式先验知识，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令人愉快，也更不确切的了。这意味着把历史先验知识设想为一种宏伟的、静止的、空白的形态，它于某一天在时间的表层产生，并对人类的思想施加专制，而这种专制无人可以逃避；而且，它会突然消